

创造性叛逆的启示

——刘小刚著《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与跨文化交际》评介

韩月

鹰潭应用工程学校

[摘要]创造性叛逆是指原语文本在译入语境下的流传过程中发生的与作者原始本意相背离的理解与阐释。作为译介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创造性叛逆在跨文化交际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刘小刚在他的《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与跨文化交际》一书中采用历史描述与理论阐发相结合的方法，对创造性叛逆的概念内涵、译语语境中的文化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究，并对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如何走出去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具有现实启发意义。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主体间性；意识形态；诗学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1.11.919

引言

《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与跨文化交际》是由南开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正式出版的专著，其作者刘小刚致力于译介学等研究，曾多次在各级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与跨文化交际》一书中，刘小刚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对创造性叛逆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深入探究，并对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创造性叛逆的存在形态以及文化意义进行了详细描述。在这本书中，刘小刚揭示了创造性叛逆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作用，更进一步对跨文化交际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内涵、目的以及策略进行了思考。作者提出世界文学可视为一种文学的跨文化交际，并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上。通过本书，对创造性叛逆的形态、成因以及文化意义等产生进一步理解的同时也引起了我们的诸多反思。

一、创造性叛逆之思

关于创造性叛逆的思考，作者刘小刚主要于正文第一章部分进行了详细论述，更是着重指出了前理解的重要性作用。作为文本间的跨文化活动，翻译活动与译者的理解密切相关。正如伽达默尔曾指出：“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词语所进行的解释过程（伽达默尔 1999：345）。”翻译过程往往包含着理解与表达两个阶段，其所体现出的是译者对于原语文本的理解与阐释，是基于译者理解基础之上的文本再创造。这也就意味着在一定语境下，前理解赋予译者的自身视域和原语文本的视域之间发生交汇、融合，并生成了新的意义，这也正是创造性叛逆的本质所在。

然而初涉“创造性叛逆”一词，不禁会联想到这样的问题：创造性叛逆既是对原文的叛离，那是否是对翻译忠实观的反驳呢？翻译忠实观一度被视为翻译首要准则，但不可否认的是译界对于翻译存在着一个普遍认识，即翻译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再现或者贴合原语文本，这也就意味着与原文产生背离是不可避免的。但用创造性与叛逆相结合来描绘背离的现象，是否意味着承认译介中的误读、误译等现象具有一定价值，而其价值则在于创在性的存在，但又应如何界定这个价值标准呢？对此，谢天振教授指出这类想法事实上本身就是一种误读（谢天振 2012：36），刘小刚教授也于书中进行了相关阐释，指出对创造性叛逆进行理论探求的目的不在于讨论该如何对翻译进行

指导，而是对翻译中存在的实际现象进行探讨和解释，文学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才是关注的重点。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要聚焦于文学呢？创造性叛逆是对原语文本的背离存在这点毋庸置疑，然而在翻译中叛逆现象普遍存在，单独将文学翻译与创造性叛逆进行探讨目的何在呢？作者刘小刚致力于比较文学的研究固然是原因之一，通过阅读，笔者认为作者还想通过对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创造性叛逆这一现象进行探讨，从而让人们重视隐含在文学典籍翻译之下的跨文化交际问题。文学作品往往是文化的浓缩映射，既是代表又是典型，且跨文化交际的文化输出也多借助于文学译作为媒介。

二、主体性之探

主体性、意识形态以及诗学是书中三大研究模块，通过对本书的阅读，笔者认为关于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探讨与主体性研究密不可分：意识形态调控人的思维模式，进而影响人的认知与活动，但同时意识形态亦通过人得以维护和发展；诗学为主流文化所控，影响并制约人们的创作形式，但诗学观念亦是为人所持，且其形态由人所控。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和诗学既是制约因素又是主体的能动性体现。因而，意识形态和诗学探讨都可归于文化因素影响下对主体性研究的延伸探求。故于此，笔者将着重探讨主体性的问题。

关于主体性的探讨，首先需明确谁是主体。无疑不同学者^①对此问题有着不同解读，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显然不容忽视。作为译语文本的创造者，译者处于翻译活动的中心，对于译本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但问题在于译者是唯一的主体性因素存在吗？曾有学者提出，从狭义层面看可将译者视为翻译主体，而从广义层面看翻译主体则应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许钧 2003：11）。于此，我们又需反思一个问题，那就是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和翻译主体是等同的概念吗？两者之间无疑是有一定联系存在的，或者说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从某一层面而言确实可以理解为翻译主体，但笔者认为两者之间仍然存有差异。刘小刚提倡的“主体间性”一说正是证明了差异性的存在，翻译主体往往指翻译活动中的参与人员甚或视译者为准唯一主体存在，而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则呈现出多维共建性特点。

事实上，关于创造性叛逆的主体探讨由来已久，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中就提出“除译者外，读者和接受环境等同样是创造性叛逆的主体（谢天振 1999：214）”。作者在本书中

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由于跨文化特性，翻译中的主体是多重主体，由作者、译者和读者等构成，且其相互之间更是一种将对方存在作为前提的“共在的自我”（许钧 2003：355-356）。在此基础之上，借助对于接受环境中的权力话语进行分析与探讨，作者刘小刚进一步表明译者主体性并非决定性因素，接受环境中的各类要素，如意识形态和诗学，都具有主体性作用。译者等多重主体是翻译过程中作品文本意义的共同缔造者与分享者，在文本创造中无疑呈现出“间性”特征，而将意识形态及诗学等环境要素纳入探讨，才真正揭示出“主体间性”的要义所在。意识形态和诗学等因素的主体作用首先体现于文本构建中，不仅和译者的“前理解”息息相关，更是以隐形之手调控着译者和读者的认知与理解活动，这是由文化与权力话语等因素所致。其次，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在文本重构中无可撼动，但就文本流传而言，读者和文本接受环境中各类要素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虽然二者与译者这一主体有着紧密联系，但同时也揭示出了主流文化之下外界环境对于文本的认同度与接受度，因而也体现出主体性作用。这就意味着，主体间性所考察的不单单是翻译过程，更是涵括了文本流传在内的整体过程中译者、读者以及接受环境等多重主体因素是如何相互影响却又相互关联的共存状态。从理解到构建再到接受，从文本生成到流传，多重主体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贯穿于整个翻译活动之中。简言之，主体间性不仅揭示多重参与主体间的联系，更是藏于文字之下的多重外界环境要素交织作用的表征。此外笔者认为，主体间性的存在实际也揭示出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正是因为多重主体的协同制约，外来文化因子促使译者突破原视域的限制，开拓视域而形成对规范的僭越，但受读者及接受环境所限，译者必须尝试回归于主流之下。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之下，不同文化碰撞、融合，新成分因子为原语文本增添新内涵的同时也为译语文化带来新的活力，文本的发展也因而具有无限可能性。总言之，创造性叛逆贯穿于整个作品文本的流传中，它既存在于文本翻译活动中，却又跳出了局限，充分彰显着活力与生机。

三、中国文化之悟

在书中，刘小刚不仅对创造性叛逆现象，以及主体性、意识形态和诗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更是对中国文学与文化如何走出去这一现实问题做出了思考，从文本的内在目的与外在语境两个角度出发对创造性叛逆进行了肯定，并提出中国文化要想真正走出去，我们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持以宽容博大的胸襟，方能使得中国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展现出应有之色。

事实上，关于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这一问题，谢天振教授在为本书编写的总序中也对此给予了着重点关注。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翻译早已不再局限于文本领域，而是一种社会性活动，构建并承载者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对话与交流。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

文化输出不仅为展现特色面貌，更是为了树立民族文化身份进而掌握话语权。但在西方文化的强势侵袭下，中国本土文化无疑遭受着巨大冲击。因而在不断提高国家硬实力的同时，对于文化软实力的增长也不容忽视。从书中可看出，作者刘小刚进行个案阐释时所列举的实例都是国外作品的汉译现象，当然晚清时期国外文学典籍的大量引入确为当时的实际现象，然而这也不免让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中国文学的英译或是外译情况显然令人担忧。虽然近年来，众多学者为此做出了诸多努力，然而在西方或者说世界舞台上，中国文学的声音仍旧是薄弱的。在文化碰撞与交际日益频繁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文学、文化要想坚守自我并在世界舞台上构建起自己的特色文化身份必然要面对如何实际有效地走出去这个难题。

四、结语

作为译介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创造性叛逆在跨文化交际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结合个案证实的手法，刘小刚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与跨文化交际》一书中从理论阐述到个案实证，对创造性叛逆的形态、成因以及文化意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并从主体性研究、意识形态以及诗学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而其后更是将视线转向了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这一现实问题上。从现象阐释、理论探寻再到实案例正，作者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相连，更是引申到当代文化传播实践中，颇具启发性。在文化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如何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如何在保持自我的前提下灵活发挥创造性叛逆的优势，从而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国门并更有效的和外国文学、文化进行沟通、交融，进而融入到世界文学大舞台中，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以上乃笔者读后所感，浅以论之，有待指正。

注释：

① Berman Antoine: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John Donne* [M]. Paris: Gallimard, Paris, 1995.

② 袁莉. 关于翻译主题研究的构想[A]. 张伯然、许钧.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译学研究[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397-409.

③ 杨武能. 翻译、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文学翻译断想之一[A]. 许钧、翻译思考录[C].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227-235.

参考文献：

[1]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 洪汉鼎, 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1999.

[2]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3] 谢天振. 创造性叛逆: 争论、实质与意义[J]. 中国比较文学, 2012(2): 33-40.

[4] 许钧. 翻译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5] 许钧.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 中国翻译, 2003(1): 6-11.